

QIUSHICONGSHU

主编 闻树国

求是丛书

BAIMAWENTI

白马问题

著 编

艾思奇 魏 诤

QUSHICONGSHU

主编 闻树国

求是丛书

BAIMAWENTI

白马问题

编

魏 诤

著

艾思奇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马问题/艾思奇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 10

(求是丛书/闻树国主编)

ISBN 7-5366-5441-3

I. 白… II. 艾…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集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705 号

白 马 问 题

求 是 丛 书

艾思奇 著

魏 浩 编

责任编辑 苟坤明

封面设计 郭 宣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38 千 插页 4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66-5441-3/I·1055

定价:17.00 元

内 容 简 介

《白马问题》是史学与哲学名家著作“求是丛书”之一种，本书收录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一些代表性论文。《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包括主要规律和范畴）最早的通俗解释与阐述。论文部分包括《有的放矢》和《白马非马》，前者是关于学习与研究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探讨和论述，后者是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新哲学的人生观、黑格尔哲学等辩证法基本规律和问题的研究与论述。全书在较大程度上再现了作者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哲学立场和观点，思辩色彩强，用语平实，通俗易懂，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难忘的岁月

王丹一^①

1966年3月22日的下午，我到医院为艾思奇送去晚饭并照料他用餐，看到他食欲还正常，心中稍感宽慰。当我离开医院时，他攥着我的手艰难地说：“你放心吧……”因为前两天负责为艾思奇治疗的医生也说过“请您放心”的话，而且住院期间两次危急经抢救缓解，所以当时无论医生和家属都对患者仍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就在当天夜晚9时15分，艾思奇便与我们永诀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无法接受，以致后来我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的。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尚不知失去父亲将会带来怎样的不幸，但个个都失去了往日的欢笑，脸上好似布满了层层乌云，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捱过那与亲人永别撕心裂肺般痛楚的日子。

当时我们的住地离城20多公里，但70高龄的帅孟奇大姐特地从城里来西郊看望；邓颖超大姐曾写过两封慰问信；康克清大姐和当时任人大校长的吴玉章老也打来电话……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学、老朋友纷纷发来唁电、唁函，情深意切，都鼓励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强起来。他们大都了解我们在延安的情况，也知道我在解放以后，因医院造成的医疗事故，常年为疾病所苦。李培之大姐

^① 王丹一女士是艾思奇同志的夫人。

更是关怀备至，硬拉着我站起来，花了一上午的时间陪我到室外散步。她向我详细叙述了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她是如何度过那些痛苦的日日夜夜的。郭明秋同志当时是我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他对我说：“你是艾思奇的历史见证人，他留下许多手稿需要整理。你对他的思想和字迹都比较熟悉，应该好好生活下去，继承艾思奇同志的遗志，为党多做些工作。”

凡是与艾思奇共过事的同志大都了解，艾思奇作风正派，朴实敦厚，工作勤奋，胸怀坦荡，一生淡泊名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讲课、写作，以及其他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他从来不去钻营人际关系，不做追名逐利之事，也不为谋取一己之私利而耗费光阴。“业精于勤”和“劳谦”这两条古训，是他书于案头，用以自律的人生准则，也是他一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撰写了《大众哲学》等论著，艾思奇早在30年代就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到延安后，又受到中央领导的信任和尊重，但他从未向党伸过手，也不曾想过以学术为阶梯，谋求个人的名誉地位。他始终如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在延安早期，毛泽东同志曾与艾思奇有过较密切的交往。毛泽东同志读了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逐字逐句抄录了19页之多，又转送给艾思奇看是否有抄错之处。像这样的事，艾思奇生前从未向人谈起，更不愿以此示人，炫耀自己。解放后，为便于保存，我曾拿到荣宝斋装帧。在该店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看到，她没想到毛主席曾对艾思奇有过那样高的评价，并写下那么多的字，当下她对我提出要由当代书法家题字或请人写跋。我说要和艾思奇商量，当我向思奇提起时，他坚决不同意，严肃地说：

“不要招摇，快收起来！”直到他去世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才将它作为革命文物，送交当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转革命博物馆。

艾思奇对于党的工作和任务，无论多忙多累，从不畏难叫苦，哪怕废寝忘食，也要努力做好。而对待名利和毁誉，却淡然处之，就连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时，他也是把前面的位置让给别人，自己往后靠。1964年中央领导与中央党校全体学工工人员合影时，毛主席想找艾思奇握手，找了好几排才发现他。一次，朱德委员长宴请他的老师李根源时，特邀艾思奇作陪。有人觉得奇怪，因为他从未向人提起他的父亲李曰垓早年与李根源先生和朱德委员长的交往。当有人向他提及《大众哲学》的影响与作用时，他总是诚恳地说：“《大众哲学》成书仓促，写作粗糙，书中还有错误。”对于艾思奇来说，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他一贯的坦诚。就在他病危之前的第一次住院时，还多次表示要写一本新的《大众哲学》。

建国之初，艾思奇即在马列学院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在校外兼职很多，确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曾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时社会科学方面的正式代表为15人（这15人是：陈伯达、范文澜、谢觉哉、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胡绳、李木庵），参加制定了政协组织法与共同纲领，选举全国政协委员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委员，拟定国旗、国徽，决定首都所在地和年号。这是解放后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以后，又陆续参加了国务院文教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对外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合在一起的）的组建工作。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这些头衔不仅仅是一个荣誉职务，而是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扎扎实实地去做大量工作。

当时，全国政协成立的学习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学习理论。艾思奇为主讲人之一。这些高级

民主人士不仅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而且学识渊博。记得政协学委会的联系人朱洁夫同志来家介绍第一次听课的情况时说,参加学习的有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等等。艾思奇深知这样的课不好讲,稍一不慎就有很大的反响,甚至影响到共产党的形象。但他知难而进,认真准备,力争把每一课都讲好。此外,他还应中联部和对外文委的邀请,给兄弟党的领导人和国际友人讲课。记得越南党的领袖胡志明主席就曾在钓鱼台多次听过艾思奇讲解《实践论》和《矛盾论》。艾思奇无论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对一般干部、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都一丝不苟地认真备课,针对不同的听众撰写讲稿。他还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北大、清华讲大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社会发展史。尽管额外的讲课写作任务增加了,他在校内的讲课和领导工作却丝毫未减。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建国之初我党亟待进行的理论、教育、宣传工作中去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却引起了陈伯达和马列学院个别领导的不满,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记得一次周末在食堂吃饭时,身为副院长的陈伯达当着艾思奇的面竖起大拇指说:“教员是九品官,不要翘尾巴。”回到家里我表示不解地问:“共产党还分什么几品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思奇一笑了之。艾思奇 1939 年在延安时就担任过中央文委秘书长、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总编等领导职务。1948 年调马列学院只当一名教员,他本人毫不介意,而陈伯达却以己之心度人,我当时感到不可思议。

艾思奇一生从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建国之初,马列学院校址为原清华大学农学院(颐和园对面),院领导和几个教员住在一进门的四合院内,我们被分在两间小南屋。里间只能摆一张单人床,一个洗脸盆架和一张方凳。最伤脑筋的是那张沙发床,由于年久失修,中间凹进一个大坑。我们只好在床的内侧加一块木板,一家三口就睡在上边,我夹在中间,靠左睡就压着孩子,靠右躺又影

响大人,经常休息不好。外间作办公室,放着书架、桌椅,还有火炉,挤得满满的。那时,孩子已经4岁多,无处玩耍,经常围着桌子转,闹得大人无法工作。第二个孩子只好留在上海的外婆家抚养。这种居住条件极不利于艾思奇工作,我便向中组部提出请调,希望带着孩子换个单位,也让艾思奇安生一点。安子文部长同意我到中组部去工作,于是我带着孩子走上了新的岗位。住在中组部“妈妈院”内一间约3平米的小屋。因为我要上班,孩子身体不好,请了个小阿姨,三个挤在一张双人床。周末我们一家人无处团聚,李培之大姐知道后,把这一情况反映到华北大学吴玉章、成仿吾二位校长那里。两位老领导说:“艾思奇也是我们学校的教员,可以在东四六条给他分一间较大的屋子,起码有一张双人床,一家三口在假日能有个住处,他来讲课也好有个休息的地方。”这就是艾思奇再次修改《大众哲学》的地方,也是我们自结婚到解放以来最宽敞的住房。直到1952年,在马列学院住房条件才得到改善。

大概因为是“九品官”吧,所以外出也无交通工具。为了节约时间,一般是什么单位请讲课,即由他们派车来接。如无车,艾思奇就坐三轮车或直不起腰的公共车(当时公共交通极不发达,从颐和园进城更不方便,有一种像大木箱式,以木炭为燃料的公共车)去讲课,他全不介意,安之若素。而后交通条件虽有所改善,后来又当了副校长,即使有专车,凡因私事用车,包括看病,他一律计价交费。40多岁还学会骑自行车,腿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这样从南院到北院开会上课就节省了不少时间。

建国初期,艾思奇曾任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常到北大授课。学校规定,兼职教授月薪是几十斤小米。学校领了小米要往家送。艾思奇说:“我们是享受供给制的干部,就不要再给小米了。”可是学校已经把小米领了出来,他与我商量,我说既然小米已领出来,就请学校转送北大生活困难的职工。他听了很高兴地说:“这次就这么办,以后就不要再领了。”

艾思奇从不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为本人或亲属谋利。解放不久,他的四弟生蓠从云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来信希望二哥能为他调到北京工作创造条件。艾思奇回信开导弟弟要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艾思奇最后离开家乡时,四弟还是个毛头少年,如今大学毕业,又是学经济的,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人。若要依靠哥哥的关系达到进京的目的,不是不可能的。艾思奇认为,利用职权为个人或亲友谋私利,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所以,我们两家的亲友中没有一个由于艾思奇的关系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我弟弟是老大学毕业生,也是学经济,建国之初,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时,被分到辽宁瓦房店滚珠轴承厂工作。上海人到东北吃高粱米不习惯,加上有胃病,最终因胃溃疡而不得不回上海动大手术,为此,我感到很不安。曾想如果当初艾思奇到“革大”讲课时与领导说说,要求照顾一下,留在北京工作是有可能的。但他认为,打个招呼并不难,但绝不能这么做,要是与校领导有关的人都这么做,就会影响干部的分配原则,其他有困难的同志没有这种便利条件,又当如何呢?艾思奇在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是不胜枚举的。

二

艾思奇对读书的爱好,是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养成的习惯。为了探求宇宙和人生的道理,他曾经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留学期间,他终日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攻读,以致于用功过度患了严重的胃病,一度中断求学。从日本回国时,他带回大量进步书籍。为攻读这些书,他利用养病期间整日躲在小阁楼上,夜以继日地研读,以致引起家人的忧虑,可以说艾思奇最终放弃学工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由于不断探

索真理,才自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的。而自从他选择了以笔作武器同旧世界斗争的那一天起,更是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艾思奇读书的最大特点是锲而不舍,务求穷其精义,善于独立思考。他从不愿浅尝辄止,人云亦云。那种浮光掠影或寻章摘句用以哗众取宠的读书态度是他最为厌恶的。每当他选中一本有价值的书,必认真研读思考。尤其是在读马列原著时,他总是首先研究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主要矛盾和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而后深入地分析作者提出问题的针对性,所揭示的问题的核心和实质,以及最终解决了哪些问题,从中把握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对我们现实的意义和启示。例如,在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他说过“‘唯批’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并在读书杂记中写道:“当时俄国革命处于革命低潮的反动时期,一些人发生思想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有被根本摧毁的危险,辩证唯物论有被唯心论代替的危险,科学有被信仰主义代替的危险。因此,列宁不能不用很大力量对唯心论作有系统的粉碎性的攻击,揭露经验批判论的信仰主义的反动性和阶级根源及其假科学的面目;并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说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对于辩证法唯物论提供了新的证明。真正的科学是唯物的,这就是列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是当时俄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实际问题。”艾思奇始终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精神实质,然后将经典著作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具体分析危害中国革命的错误思想潮流,而不是卖弄词句,生搬硬套地在中国找什么马赫主义。同时,他还认为:“读原著不一定勉强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读懂,要学会把握主要内容与精神实质,特别是正面的解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有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不要求完全弄懂,科学常识知道一些是有必要的。最后他着重指出,联系实际要把注意力放在关乎革命工作的主要问题上,不要庸俗化,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要注意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要有

自我检讨的精神,要认真检查自己有没有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倾向,而不是马列主义只对他人。他平生最喜爱的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一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由于对求知的执著,艾思奇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书和读书。10余年内,家里藏书已近万册,稍有闲暇,便埋头于书海,专心致志,甚至废寝忘食。为此,被康生嘲讽为“书痴”。艾思奇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凡他认为有价值的书籍,上下都留有他的墨迹。有的则专门写下笔记、评述和随感。在未读完的《资治通鉴》上,天地头及左右两边的空白处,写满了各种符号和批注,如在第13卷《汉记》(五)汉文帝问宰相陈平关于钱粮粟内史的事,艾思奇写道:“陈平比周勃更懂得作一个宰相,应该怎样对待在他所管辖之下的各部门的具体业务,都应交给这一项专职人去负责,居于总领导地位的宰相只应总理其职,而不可能代替那些具体的职务。我们的周总理是最好的典范,他不愧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事业中的总理。”艾思奇不仅阅读经典著作如此认真,对一些当代作家书籍也认真研读与借鉴。如侯外庐先生送他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他读后连声赞叹:“写得好,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写得超过侯先生。”(因他解放前曾计划写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关于辩证法的范畴中归纳与演绎的关系时,其中有一段写道:“归纳如不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就变为浮浅的东西,演绎如不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就变为独断的东西。”艾思奇立即用大字在这一论述旁边写了“很妙”二字,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在这本书第383页中艾思奇写道:“批判以实践为基础,由个别判断经特殊判断以前发展的丰富的经验为基础,因此个别判断多表现在狭隘经验主义者的思想中,狭隘经验是拘泥于枝枝节节的现象,所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辩证法的本性是革命的,革命表现在每一具体工作上,永不自满,永不骄傲,永远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这是世界永恒发展的反映。”此类评论与感想遍布于各类书籍,记载着

他读书思维轨迹和成果。至于毛主席著作,更是潜心研究。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此他写过不少读书笔记。

艾思奇常对教研室的同志们说:“要在唯物辩证法上有真正的领悟,不了解人类历史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遗产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博览群书,深钻细研,锲而不舍地攻读,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乐趣和嗜好。艾思奇读书的范围极广,除古今哲学专著外,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都曾经涉猎。如《孙子兵法》、《周易》、《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物种起源》、《莱根谭》等都是他十分喜爱的读物。而对自然科学书籍则情有独钟,这是由于艾思奇留学日本期间读过冶金专业,在他迈向生活的第一步,担任的又是理化教员。所以多年来对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科学家的专著,读得十分仔细。艾思奇称赞汤姆生编写的《科学大纲》不失为一部完备而通俗的著作,并指出书中包含着灵魂学一类无稽的东西应当抛弃。他认为,由于科学与社会都在飞速发展,应当珍惜宝贵的时光,尽可能多地汲取精神食粮以满足工作需要。他除从图书馆借阅大量图书以外,读的书主要是靠自己的工资购买。如获得一本十分中意的好书,他总表现出由衷的喜悦。记得他曾购得一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正值校医王书文医生来家出诊,便拿出与王医生一同欣赏,兴趣盎然,并论及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青岛养病时,艾思奇与莫文骅同志相遇,谈起古代兵书与军事辩证法,十分投机。平时他沉默寡言,若与探求知识的知己相遇则侃侃而谈,乐而忘返。

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世界各国的经典原著,艾思奇还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并掌握了多种外语。早年他学会了英文;在日本留学期间,除掌握日文以外,还自学了德文,以便能直接阅读马克思及德国的理论专著。渐渐地就连文学作品也能翻译了。例如,海涅著

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即其译作之一。在延安时他曾对我说,如不是革命工作紧张,他早年本有翻译海涅全集的打算。50年代他已40多岁,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更准确地理解列宁主义理论,他自己又确定了学习俄文的目标,每日清晨必有半小时学俄语,雷打不动。他平日口袋里总装着许多小纸条,上边记着俄文生字,凡到医院看病或在讲课、会议中短暂的休息时间内,总是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一读,背一背。经过刻苦努力,他不仅能阅读苏联专家的来信,还能借助字典顺利地阅读俄文版的马列经典著作了。而这一切都是在他长年满负荷的工作,平时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讲课、写作、作报告之余,争分夺秒地勤奋读书、锲而不舍、刻苦学习换来的。

三

艾思奇常说:“做学问其实也就是做人,要讲原则,要实事求是。”他一生身体力行,喜欢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而一旦发现自己在讲课或著述中有缺点、错误,便立即改正,决不固执己见,文过饰非。

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在北京大学给北大、清华的教师辅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有位老教授提出,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说的人是从类人猿演化过来的观点不对,因为他是以当时达尔文研究资料为根据的,而现代科学却证明人是从森林古猿演化过来的。对这位教授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对经典著作的歪曲和攻击,应该批判。艾思奇不同意这种意见,而是认真查阅并研究了许多资料,确认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确实受到时代和材料的某些局限。于是,便诚恳地接受了这位老教授的意见,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作了纠正。

在解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苏联哲学的影响,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中,曾经把形式逻辑归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甚至把它摆在与辩证法相互排斥的位置。建国后,在一次有北大、清华一些著名学者、教授参加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上,金岳霖先生直率地提出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是否是一回事的问题,艾思奇则坦诚地承认:过去我们的确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同了。这是沿用了苏联哲学界的提法,同时,也是由于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根据地处于被包围之中,许多书没有看到,没有翻译过来,今天同几位先生交换了意见,很有益处,回去要好好研究。以后,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并在讲课中明确肯定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性。这种虚心好学、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敬。

作为党内的知识分子,艾思奇是一贯严以律己的。他始终认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要永远向革命的斗争实践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生活学习。他十分推崇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名言,并一生努力付诸实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腐朽作风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艾思奇也曾无端地遭人嫉恨、打击和非难。不论遇到怎样的情况,他的态度始终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严以律己,荣辱不惊。

1953年,艾思奇解放后第一次挨整。主要罪名是由于他在讲课中说过“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有偶然性”,“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道路也有矛盾”,这两句话被认为是犯了“非常荒谬的错误”,连同那篇已检讨过多次的发表在《学习》上的文章,从而引发了对艾思奇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面批判,说他“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一个实际问题,同时,也很少切实地钻研过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实,前一个“错误”是他在讲课时讲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时,以领袖的产生为例,指出中国革命要产生自己的领袖是必然的,但这个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则具有偶然性。

这实际上完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后一个“错误”是他在课堂上讲矛盾问题时，讲过“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也有矛盾，虽然都是暴力革命，但是道路又是不同的”。联系到俄国“十月革命”采取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与我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来说，即使“矛盾”一词略有不妥，恐怕也不能说是“非常荒谬的错误”吧？

这次批判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大众哲学》。罪名是“庸俗化”、“观点混乱、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性”、“‘机械唯物论’对现在读者是利少弊多……”等等。这种对于30年代作品的批判，几乎是无法辩解的。当时，艾思奇本着严以律己的态度，不仅被迫对以上问题在党委会上多次作检查，写书面“检讨”，而且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同意永不再版《大众哲学》，并将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已经校好清样、即将付印的《大众哲学》修改版撤回。其实，对于《大众哲学》的评价及其历史作用人们自有公论。在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之下，一个年轻人为大众启蒙所做的第一次哲学通俗化的尝试，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呢？但是，在解放之后，用现代人的认识和眼光去挑剔、去批判则是令人费解的。这种纠缠历史、翻老账，以昨日之非为今日之过的整人方法，是艾思奇始料不及的。当时，在陈伯达等人的主持下，马列学院党委内部专门写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学院委员会关于艾思奇同志过去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检查报告》，并直接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其目的和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后来有一天，已经离开马列学院上调中央工作的陈伯达回到党校，曾当着我的面幸灾乐祸地说：“艾思奇少年得志，大不幸也！”这确实暴露出了当时积极整艾思奇的某些人的心态。

加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艾思奇曾仗义执言为周文同志去世的处理一事鸣不平，这就更得罪了少数人，艾思奇因而被某些人视为眼中钉。

记得在1955年艾思奇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有位教员在辅导中级班学员学习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对于学员提出恩格斯是否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一时解释不清楚,就去问艾思奇。艾思奇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为只要具备一些哲学史的知识,再从上下文整体上理解恩格斯的立场和观点,恩格斯在文中针对批判不可知论而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他根据恩格斯的原文及其精神实质做了具体的解释,使这位教员豁然开朗。艾思奇的这种理解也得到了教研室绝大多数教员的同意。

1957年“反右”时期,艾思奇则由于以上所述有关思维存在的不同观点被认为“非整不可”。当时,艾思奇因患高血压心脏病在青岛疗养,病未痊愈就被召回来参加运动。在运动中,哲学教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由当时在哲学教研室并无任何职务的康生老婆曹轶欧打头阵。并有目的地搜集艾思奇的材料和“右派言论”,组织批判。企图把艾思奇打成“右派”,打成所谓“三楼(教研室所在的楼)反党小集团的头头”。艾思奇回京不到10天,在某些领导的组织动员之下,党校一些人就给艾思奇贴了200多张大字报。在几次批判会上,艾思奇都被迫做了检讨,但他在学术问题上,却以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赤诚,始终坚持在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仍保留意见”。而曹轶欧则攻击说:“还要保留,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不能容忍的。”也许是考虑到艾思奇的社会声望和影响,不便直接下手打成“右派”,于是将他内定为“中右”,“不戴帽”,1958年被带病下放到河南登封县蹲点。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志则蒙冤受屈,遭到了更大的不幸。一位始终坚持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同一性观点的老同志陈仲平被打成“右派”以后,竟被下放劳动改造20多年,历尽了坎坷和屈辱才得以平反。

由于艾思奇有着比较坚强的党性,对于种种嫉妒、排挤、打击